



社會權利的 來源(下)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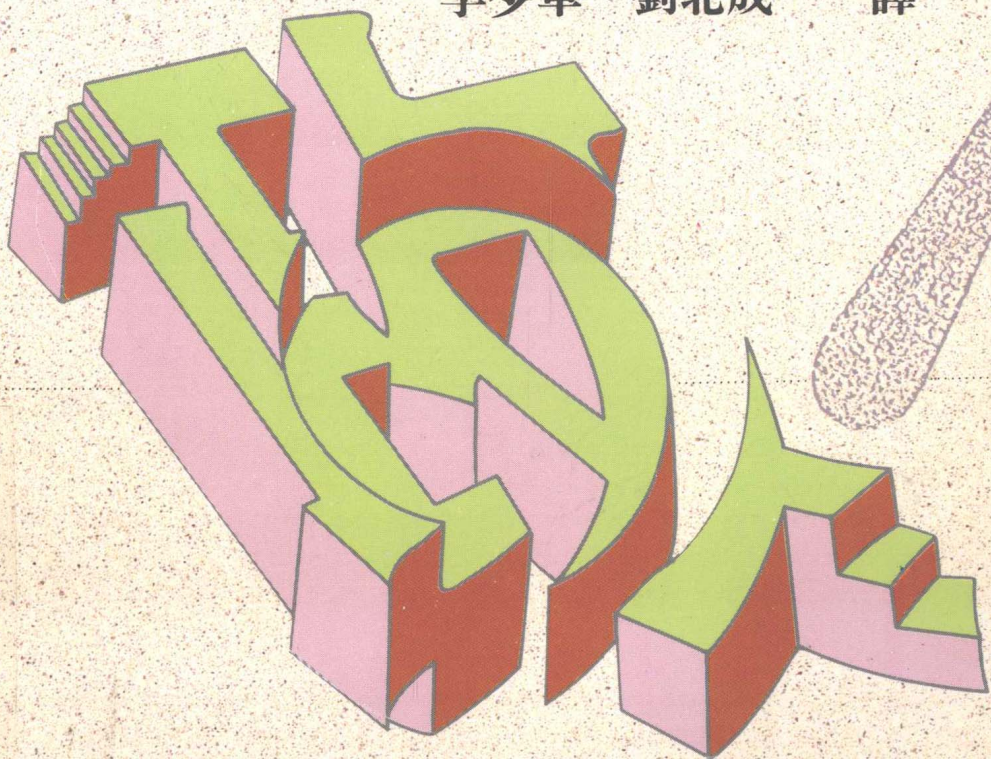
自源起到西元1760年的權力史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麥可·曼——著

Michael Mann

李少軍、劉北成——譯



代思潮系列叢書

社會權力的來源 (下)

—自源起到西元1760年的權力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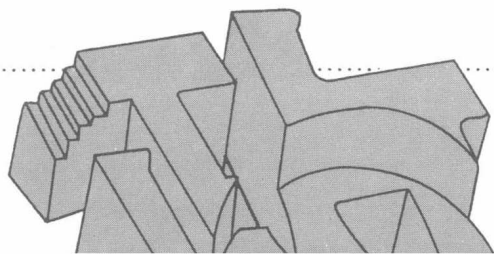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麥可·曼—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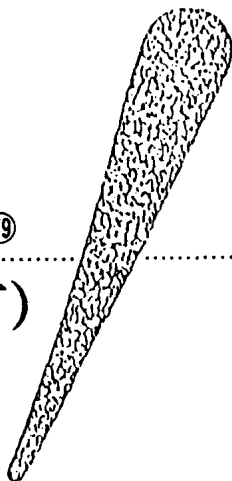
Michael Mann

李少軍、劉北成一譯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78⑦9

社會權力的來源(上)(下)



原 著 > 麥可·曼
譯 者 > 李少軍、劉北成
執行編輯 > 黃嫵羽
出 版 >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 賴阿勝
登 記 證 > 局版臺業字第 1166 號
地 址 >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6-4 號
電 話 > 219-3338 · 363-1407
傳 真 > 218-2859 · 218-2860
郵 撥 > 0104579-2
印 刷 > 雨利印刷廠
裝 訂 > 欣亞裝訂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 1995 年 1 月



定價 / 新台幣 600 元

(上、下合售，不分售)

●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551-813-6(套書)

《購書專線 / (02) 218-6492》

《免費申訴專線 / 080-201122》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一卷,自源起到西元1760
年的權力史 / 麥可·曼(Michael Mann)
著;李少軍,劉北成譯.--初版.--臺北市
:桂冠,1994[民83]
面; 公分.--(當代思潮系列叢書
; 78-79)

譯自: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含索引

ISBN 957-551-813-6 (一套;平裝)

1.社會學—哲學,原理 2.權力

540.2

83010566

目 錄

上 冊

當代思潮叢書序	i
政治學類召集人序	vii
譯者前言	x i
前言	x v
第一章 作為有組織的權力網絡的社會	1
終極首要性	4
人類本性和社會權力	6
有組織的權力	9
集體權力和個體權力	9
廣泛性、深入性、威權性和漫散性權力	10
流行的分層理論	14
「社會」的「層次、維」	16
批評	20
人類是社會性的，不是社會的	20
你生活於哪個社會？	22
組織和功能的混雜性	24

權力組織	25
權力的四個來源和組織	31
IEMP 的總體模型，它的廣度和遺漏	39
第二章 一般社會進化的結束：	
史前人如何躲避權力	47
引言：傳統的進化史話	47
最早確定下來之社會的進化	55
集體經濟權力的穩定關係的出現	61
集體性的意識形態權力、軍事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出現	64
有關分層和國家起源的進化理論	68
從進化到退化：迴避國家與分層	87
第三章 美索不達米亞的分層、國家和	
多權力行爲者文明的出現	101
導言：文明與沖積農業	101
美索不達米亞：灌溉和它的地域權力相互作用	108
西元前三一〇〇年左右分層和國家的出現	114
作為同盟的文明	123
灌溉農業與專制主義	129
軍事主義、傳播、專制主義和貴族政治：真實的相互關係	135
結論：作為交疊權力網絡產物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	139
第四章 對分層、國家和多權力行爲者文明出現的比較	
分析	145
印度河谷的文明	146
商代中國	147
埃及	149
米諾斯文化的克里特	159
中美洲	162

美洲安第斯地區	167
結論：有關文明出現的理論	170
第五章 最初的支配性帝國：強制性合作的辯證法	179
背景：軍事主義的發展與邊境	180
阿卡德王國的薩爾貢一世	183
軍事權力的後勤問題	188
政治權力的基礎構成	195
軍事化經濟的後勤：強制合作策略	199
強制性合作的五個方面	203
軍事平定	203
軍事乘數效應	204
權力當局與經濟價值	205
勞動的強化	206
強制普及	208
意識形態網的普及：美索不達米亞宗教	212
帝國的辯證法：集權和分權	221
古代帝國的比較研究	231
結論：軍事權力重組社會發展	238
第六章 「印歐人」與鐵器：	
擴張中的多樣化權力網絡	245
印歐人的挑戰	246
鐵器時代的挑戰	253
第七章 腓尼基人和希臘人：	
分散化的多權力行為者文明	261
正出現的分散化經濟：腓尼基——讀寫與貨幣	262
希臘權力的起源	268
希臘的波里斯	270
早期的貿易和波里斯	272

裝甲步兵與波里斯	273
希臘：語言、讀寫和海上強權	280
希臘帝國主義：商業化、海軍力量和奴隸制	285
對人類理性的崇拜	290
奴隸和波斯人有理性嗎？	293
古典希臘的階級	297
希臘三重權力網絡及其辯證法	307
最終的矛盾和滅亡	313
第八章 復興的支配性帝國：亞述和波斯	319
亞述	320
波斯帝國	328
第九章 羅馬人的領土型帝國	345
羅馬權力的起源	346
羅馬帝國——有皇帝和沒有皇帝	359
羅馬帝國的群眾：奴隸和自由民	360
帝國對群眾的經濟之利	366
羅馬統治階級的擴大	370
帝國國家和軍團經濟	377
軍團經濟的弱點：孤立的權力	387
西羅馬帝國的衰落和滅亡	390
結論：羅馬人的成就	407

下 冊

第十章 超越性意識形態：基督教信徒世界	415
導言	415
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內的普遍號召力	418
基督教——解決帝國矛盾的出路	421

羅馬帝國內意識形態權力的基礎	427
基督教的早期傳播	435
爲什麼基督徒受到迫害：民衆「信徒世界」的動員	439
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走向妥協？	447
多納圖斯派異端和奧古斯丁：妥協的失敗	453
超越羅馬，進入基督教世界：特定的「信徒世界」	458
第十一章 世界宗教的比較：儒教，伊斯蘭教，(尤其是)	
印度種姓	469
中國和孔子簡論	470
伊斯蘭教簡論	473
印度教和種姓	478
種姓界定	480
意識形態權力的成就：第十、十一章的總結	498
第十二章 歐洲的動態發展：I 深入階段，八〇〇至	
一一五五年	513
基本觀點	517
作爲多重互動網絡的封建主義：意識形態、軍事／政治 和經濟權力	521
封建社會的動態發展	549
向資本主義轉變的萌芽	561
結論：對歐洲動態發展的解釋	565
第十三章 歐洲的動態發展：II 協調性國家的興起，	
一一五五至一四七七年	571
十二世紀國家的收入來源和職能	573
財政總收入的趨勢，一一五五至一四五二年	581
財政收入和支出，約翰到亨利五世	583
內涵 I：民族國家的出現	589
內涵 II：廣泛性權力和協調性國家的成長	598

非領土型發展的可能性：勃艮第國家的興衰	599
領土集中的後勤基礎	602
技術革命及其社會基礎	609
第十四章 歐洲的動態發展：III 國際資本主義與有機的民族國家，一四七七至一七六〇年	615
國家財政收入的模式，一五〇二至一六八八年	616
軍事革命與國家體制	619
從協調的國家到有機的國家	626
新教教派與基督教廣泛性權力的終結	633
國際擴張	644
絕對主義政體和立憲政體	649
國家財政開支與戰爭，一六八八至一八一五年	658
國際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一六八八至一八一五年	668
第十五章 關於歐洲的結論：歐洲動力的解釋——資本主義、基督教和國家	681
歐洲的動態發展	681
資本主義與國家	696
第十六章 農業社會世界歷史發展的模式	705
四種權力來源的作用	705
一種世界歷史進程	713
階級的世界歷史發展	718
歷史上的偶然事件	723
集體權力的不平衡發展	724
兩種發展類型的辯證關係	726
權力的轉移	733
索引	737

第十章

超越性意識形態： 基督教信徒世界

301

導 言

在前幾章裡，我們初步地考察了第一章所確定的兩種意識形態權力。在亞述帝國和波斯帝國的實例中，我們看到了作為內在精神(immanence)和士氣(morale)的意識形態，也就是，通過意識形態權力的基礎結構——溝通系統、教育和生活方式——而形成的國家和統治階級的凝聚力。這種基礎結構主要是一種口頭的，而不是書面的。在此之前，我們在文明的發軔期看到了作為超越性權力的意識形態。這種權力跨越了既存的經濟、軍事和政治權力的網絡，用神性權威確立自身的合法性，但也滿足現實的社會需求。然而，在上述的考察中，史料根據是不太充分的。以後的歷史有了更充分的史料，因此我們能夠做出更清晰的考察。

本章將要展示羅馬帝國後期兩種意識形態權力之間的「競爭」。一方面，意識形態強化著羅馬統治階級內在的士氣，而另一方面它表現內基督教的超越性權力——我稱之為基督教信徒世界(Christian ecumene)。這是一種廣泛而深入的革新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漫散性的而非威權性的權力。它在一個幅員廣闊的社會中的所有重要階級中傳播。這種階級超越性並不徹底，但卻

具有世界歷史性的影響。兩種意識形態權力都滿足現實的社會需求，都依賴於各自的權力基礎結構。經過一個時期的衝突之後，它們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妥協。這種妥協經歷了中世紀的「黑暗時代」，成為第十二章所描述的後來歐洲發展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

然而，前所未有的強大的超越性宗教之突然崛起，並非是一種獨一無二的現象。自佛陀誕生到穆罕默德去世的一千年左右的時間裡，產生了四種至今支配著全球的重大「書本宗教」(religions of the book)：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和伊斯蘭教。如果我們認為佛教和印度教是在西元前一〇〇年前後最終定型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把上述時間壓縮為七百年左右。從西元前一世紀起，佛教和印度教與另外兩種宗教一樣，開始主要關注於個人的和普遍的拯救——其目標是使一切人無論其階級和特殊身分都可以通過某種系統的道德生活安排而擺脫塵世的苦難①。

本章僅限於討論一種救世宗教，即基督教。下一章我將扼要地討論伊斯蘭教和儒教。然後，我將比較詳細地分析印度教和佛教，但在這一對相關的宗教中我將重點分析前者。我認為，印度教是迄當時為止人類所經歷的意識形態權力的頂峰。所有這些宗教都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獨立的超越性意識形態權力的重大體現。本章和下一章所討論的主題就是這種權力的性質。

基督教是一種意識形態權力。它不是通過武力來傳播的；它歷經幾百年的制度化和強化，但不是憑藉國家的權力；它很少使用經濟誘惑或經濟制裁。它自稱是壟斷了有關生活終極「意義」和「目的」的知識的神聖權威。民衆對此信以為真，使它得以傳播。民衆相信，只有成爲一個基督教，才能度過真正有意義的一生。因此，它的權力首先基於基督的啓示與皈依者動機和需求之間的契合。如果我們想理解基督教的權力，我們就必須重構這種契合關係。

基督教本身的情況有助於我們重構這種關係的一個方面。正

如穆罕默德最早指出的，它是「書本宗教」的一種。幾乎從發軔之初起，它的信徒就筆錄了它的啓示和有關註釋。而且，這些教義涉及到實際的（或據稱實際的）歷史過程。基督教是用歷史文件來給自身提供合法性，其中最重要的文件就是《新約》。學者們對這些文件稍做歷史學和語言學的加工，便可以追溯基督教教義的發展情況。

但是，這種關係的另一方面，即皈依者的需求和動機的情況，則不那麼清晰。由於基督教歷史其他方面的遮蓋，學者們對此一直不予重視。基督教的歷史一直是一部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偉大成功歷史。它的傳播十分迅速和廣泛，以致顯得十分「自然」。最近幾個世紀以來，基督教對我們文化的控制減弱了，但奇怪的是，這反而強化了學者們把基督教的興起視為「自然」現象的傾向。最近幾個世紀以來的大多數懷疑論者沒有繼承吉朋⁽¹⁾的事業。他們忽視研究教會史，使其成為教會人士的研究領域。教會人士撰寫的基督教著作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布道書，講述基督的啓示、信徒的無畏和信念，以及這些東西與今天的相關性。「相關性」是指確定當時和現在人類需求之間的基本相似性，從而使基督的啓示隨時在「人的本性」中找到（或應該找到）呼應。第二類是有關教義問題的神學著作。這類著作幾乎不考慮信徒的動機和需要，除非這些動機和需要能夠從某些教義的流行狀況推導出來。這種對接受者漠不關心的態度，源出於一種簡單的根本信念：基督教之所以傳播，因為它是真理。

303

上述情況導致了有關基督教權力的文獻畸輕畸重。一個典型的產物就是查德威克(Chadwick, 1968)撰寫的一部著名的有關早期基督教的異論性著作。該書有關教義的影響和發展的論述很有價值，但是對於原因的分析則是敷衍了事。因為在這個領域裡社會學研究成果很少，所以我的分析就不得不超出我的願望，追溯到很遠的時期。

另外還有一個難點，即早期基督教號召力的雙重性質。啓示是通過一系列特殊的環境而傳播的，最初是農村操阿拉米語(Aramaic)的巴勒斯坦人，然後傳播到城市中操希臘語的猶太人團體，然後傳播到希臘人的城市團體，然後是普遍的羅馬市鎮，然後是帝國宮廷和廣大農村。它首先是在東部和南部傳播，然後是西部和北部，最後是在蠻族中傳播。在傳播過程中，啓示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即使單純對教義進行分析，也能得出結論：人們的需求是不一樣的。但是，儘管啓示經歷了如此複雜的歷程，它的基本面貌依然可辨，沒有喪失任何基本要素（除了在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中有某種程度的喪失）；這就顯示了這種號召力的另一普遍性層面。這種普遍性加強了人們的信念：基督教的號召力既簡單又「自然」。但是這種「普遍」的號召力幾乎完全局限於羅馬帝國的勢力範圍內。因此，爲了探討特殊性和普遍性，我們必須考慮羅馬帝國。

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內的普遍號召力

關於基督教相對普遍的號召力，有三種教義方面的證據。第一種是基督之前的證據：從祆教(Zoroaster)時代起幾百年間中東地區一神論、救世論和信仰調和論的思潮不斷發展。這種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正如我們在第八章所看到的，面對伊朗傳統宗教的抵制，祆教的一神論救世主義變得軟弱無力。但是，在基督誕生前的一個世紀裡，這種發展非常迅速。最早的希臘哲學家曾提出原初推動力的觀念。在稍後的古典時代，這種觀念愈益帶有「宗教性」。例如，在柏拉圖的「純粹形式」概念中就包含著一種超驗的精神力。在希臘化時代，思辨哲學往往與流行的神秘崇拜混合在一起，其中有某些希臘崇拜〔如俄耳甫斯(Orpheus)、狄奧

尼索斯(Dionysus)以及埃留西斯城(在調和思想的發展中有另外波斯崇拜(如太陽神、光明之神)。結果產生了一些崇拜,據說參加這些崇拜能死後復活和得到拯救。與希臘哲學一樣,這些崇拜也傳遍羅馬帝國。這種混合僅僅是部分的,因為救贖來自於儀式,有時也來自於出神體驗,但不是來自於對世界系統而理性的理解或這種理解所派生的行為道德規範。在調和思想的發展中有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即猶太教的嚴格一神論。這種一神論最初深受波斯宗教的影響,但以後很可能基本上是土生土長的了。只是到了公元前二世紀晚期,猶太人才面臨希臘文化的挑戰。他們一分為二,一部分人相對地被希臘化了〔撒都該人(Sadducees)〕,另一部分人則強調猶太人的獨特性〔法利賽人(Pharisees)〕。爲了抵制通敵求榮的撒都該人的貴族統治,法利賽人主張民主制。爲了反對撒都該人對更大範圍文明的強調,他們給私人家庭關係制訂了嚴格的倫理要求。但是,這兩個集團都愈益依賴於書面詞句,《聖經》和註解。因此,讀書識字受到重視和提倡。

這些潮流包含著許多與民衆的需求、特定的時空相關的特點。對於被羅馬人征服而依然抵制希臘文化的那些猶太人來說,尤其如此。他們經歷了民族的以及宗教的和哲學的興奮激動。但是,我們也能感受到,在整個地中海世界,一種百川歸海的潮流日益發展,愈益趨向於一神教、倫理道德和救贖,愈益使用書面文字手段②。

第二種是基督之後的證據。在基督教團契(fellow ship)建立之後到東正教(Catholic orthodoxy)出現之前,往往很難把基督徒與某些其他的哲學、宗教和崇拜的信奉者區分開。實際上,在公元八〇年到公元一五〇年之間,從基督教團契中至少分裂出十幾種教派。我們知道其中大多數被稱爲諾斯替派(Gnostics)。*gnosis*是希臘詞,表示一種體驗性的。甚至是直覺性的,而非理性的知識。大多數教派都混合了流行的哲學和信仰(可能還受到

來自遠方的婆羅門和佛陀的影響。儘管它們彼此各不相同，但是它們比基督教本身便近似乎更早的崇拜習俗。加入儀式和神秘體驗非常重要。有些教派施用巫術消災祛邪，有些實行若行禁慾，有些則縱慾狂亂（有關證據往往出自其敵對者）。這些教派比正統的基督教更重視把救贖當作擺脫塵世邪惡和痛苦的出路。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人們的多重需求。這些需求比任何單一的正統宗教所能容許的需求更寬泛，甚至在教會建立起來之後它們仍持續存在③。

第三種證據是關於基督本人的。我承認學者中所流行的觀點，即當時確有這樣一個先知，儘管其神性設定可能是後人添加的④。由早期門徒所轉達的他的啓示（這是我們所能獲得的有關他的最直接信息）是簡單而直截了當的。這種啓示通過各種流派而傳遞給廣大民衆。他像所有的先知一樣，宣布上帝之國即將來臨。但是他補充道，任何人只要淨化心靈、相信唯一超越的上帝，都能進入上帝之國。爲此不需要任何社會資格、神秘知識、儀式及異常體驗。這種淨化不需要預先的道德行爲——皈依（必須是真誠的）本身就是淨化。沒有比這更簡單、更徹底和更平等的了。儘管基督可能從未直接考慮過超出巴勒斯坦的更大世界，但是推行他的啓示就會具有普遍的號召力。

根據四大〈福音〉(Gospels)，基督曾細心地明確提到他的門徒可能會排斥的幾種人——兒童（甚至嬰兒）、婦女、異教士兵、收稅人（人們常常認爲他們是罪人）、罪人和罪犯（無論男女）以及被遺棄的痲瘋病人。我們聽到：「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3：16）

我們這個時代已經習慣於把信仰和理性對立起來。但是基督的時代不是這樣，希臘哲學趨向於把二者結合起來。實際上，由於否定了玄秘、儀式和巫術，基督（或其福音作者）就訴諸理性

的信仰方式了。信仰和道德行為的聯繫也是很普通，很理性的。如果信仰以道德為前提，那麼保持人們的信仰也就意味著保持他們的道德。如果一個基督徒不斷地犯下罪愆，他就不能見到上帝。因此，社會的重心就放在強化信仰和道德上。社會更重視的是管束民衆，而不是踢開他們——排斥只是個別的〔福克曼(Forkman, 1972)〕。同樣，在社會壓力下，大多數基督徒會是行為端正的——關於這一點我後面還要討論。

出於上述三種證據，可以說，當被傳誦的基督教誨與當時大多數社會集團接觸時，必然會在帝國內引起某種程度的呼應。早期的基督徒承認，他們的宣傳對象是帝國的居民，他們依賴於帝國的安定、羅馬人的秩序和交通。因此普遍的號召必須符合羅馬人的特殊需求。羅馬人的世界在某些方面不能使其居民滿足。它的失誤原因何在？許多研究者都是從這問題入手的。

306

但是，這是一個錯誤的問題。正如上一章所指出的，帝國在基督時代前後獲得令人炫目的成功。與其他幾乎同時代的帝國（波斯帝國和中國漢代帝國）一樣，它明顯地促進了社會和經濟發展。毋寧說，正是這些帝國的成功導致了需要解決的困境。所有的帝國都感受到救世宗教的衝擊，儘管他們以不同的方式來對待這些宗教。宗教提供了解決帝國矛盾的出路。這些矛盾在羅馬表現得最尖銳，恰恰是因為羅馬帝國的成就最大。

基督教——解決帝國矛盾的出路

羅馬帝國和其他幾乎同時代的帝國有五種主要矛盾：

1. **普遍主義和特殊身分**。一個帝國越集權和疆域越廣袤，它就越需要培養成員之間的普遍聯繫和成員對它的依附。在羅馬，普遍主義表現為積極成員即公民這種形式；在波斯和中國，成員